

#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

## ——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福柯的著作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问世, 巴赫金的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被发现并广泛传播。将这一巧合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进行讨论, 通过讨论福柯其人其话语和巴赫金其人其符号, 可以挖掘福柯的话语思想和巴赫金的符号思想之间的联系, 认识这两位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语言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话语; 符号; 福柯; 巴赫金; 后现代

**Abstr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Foucault's works were published, Bakhtin's works were recognized valuable. To put this coincidence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ty and to discuss Foucault and Bakhtin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nk of the two thinkers to see the implications they provide for languag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ty.

**Key words:** discourse; sign; Foucault; Bakhtin; post-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14)06-0014-07

### 一、引言

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一般被认为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两次转向的三个发展阶段(高玉, 2009: 65)。在本体论阶段, 哲学家关心的是“对象是由什么构成的”; 在认识论阶段, 哲学家关心的是“我们是如何认识对象的”; 而在语言论阶段, 哲学家则关心“我们是如何表述对象的, 语言是如何呈现对象的”。可以说, 哲学的关注焦点之所以转向语言, 是因为哲学家看到语言在社会建构中所起的深层作用。

西方哲学思想的语言转向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自 17 世纪以后的三百多年间, 笛卡尔的“现代哲学”以及“科学”与“理性”的思想受到广泛吹捧, 成为时代的主流。人们试图用自

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 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 获得确定答案。然而, 这种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哲学思想, 从 20 世纪后半叶起遭到西方学术界的质疑。正如刘亚猛(2008)指出的那样, 这种质疑使西方思想学术界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醒悟过来, 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如此不断冲击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三百年之久的现代主义智力, 最终使得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福柯(Foucault)便是这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话语提升到建构知识的首要地位, 认为知识是由话语生成的, 而话

收稿日期: 2014-06-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14BY070)

作者简介: 田海龙, 男, 教授, 博导,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

语又必定是一种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来控制社会实践并保存习惯势力的手段。他在考察话语建构知识的同时，也考察了权力与知识话语建构的联系。和福柯为伍的后现代思想家还有德里达（Derrida）、布迪厄（Bourdieu）以及哈贝马斯（Habermas），但是，这里我们更有兴趣将巴赫金（Bakhtin）与之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与福柯的话语理论有着共同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思想，而且因为巴赫金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一些学术思想在半个世纪后与福柯的学术思想一起被学界关注。探索这两位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思想及其对后现代主义视阈下语言研究的启示，应该是一件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 二、福柯其人其话语

关于福柯其人，至少有两点与其后现代主义思想有着直接联系。其一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心灵造成的恐惧，其二是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接触到的优秀学者。1926 年 10 月 15 日福柯出生在法国西南部小城普瓦提埃市一个富裕的外科医生家庭。如果说他的儿童时代还比较安逸和平静，那么他的少年时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深深的打上了恐惧和不安的烙印。1939 年二战爆发时，福柯才 13 岁；1940 年纳粹占领巴黎时，福柯才 14 岁。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鲸吞法国一半以上的疆域，意大利蚕食法国南部疆土；德意轴心国强取豪夺，战争的威胁始终伴随着福柯的少年时代。在这样的生活背景和生存条件下，少年时代的福柯在死亡和恐惧的黑暗环境中长大，对当时笼罩法国的颓废情绪和战争阴影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在论及“科学”、“理性”的现代主义智力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质疑的原因时，刘亚猛（2009：284）曾经提及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指出这两次造成亿万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人们对于科学思维方法是否能被应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和道德问题逐渐发生疑问。”将此宏观思考凝缩到福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考的一个具体演义。由于世界性历史事件带来的生存恐惧严重威胁到私人生活，福柯的学术生涯对历史课题情有独钟，着迷于个人经验与人类所处的

事件之间的关系。“二战”切肤之痛的生活经历在少年福柯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得福柯认识到只有知识才能保护个体的生存并通过理解外部世界成为生存手段。由此，根据莫伟民的研究，福柯在对癫狂史、临床医学史、人文科学史以及性史和监狱史的研究中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早在其少年时代起就已大致框定了”（莫伟民，2005：3）。

如果说福柯少年时代的经历是他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客观基础，那么，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到的反思现代主义思想的熏陶则是他确信话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必备条件。1946 年秋，福柯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巴黎高师倡导“自由、求索、创新”的精神，人文底蕴深厚，精英荟萃，桃李芬芳。在巴黎高师，福柯除了研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还阅读马克思、海德格尔的著作，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福柯聆听了海德格尔在巴黎高师的忠实弟子博福雷研究海德格尔的课程，聆听了梅洛-庞蒂关于身心和语言的课程，还与阿尔都塞以及他中学的哲学老师伊波利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他还与布迪厄以及他在巴黎高师的学生德里达一起切磋讨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所有这些，推动着福柯对笛卡儿“我思哲学”的批判，也推动着他对于笛卡儿现代哲学“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反思，推动着他用“话语”这一被实际积累的存在（即档案）来取代笛卡儿的源自主体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说，福柯在巴黎高师的学习经历，他对前人思想的汲取以及与同代人的交流，为他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正如他在悼念其中学老师伊波利特的仪式上所讲：“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这些过去的学生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他为我们设立的，由他用强有力的、严肃的并且不停地变得熟悉的言语所强调的……战后不久，他曾教我们思考暴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同上：4）

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将话语视为研究的中心课题。他的话语研究围绕知识的话语形成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展开，前者构成他早期

对话语的考古学研究，后者构成他后期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关于福柯的话语研究，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92: 55-56）认为，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有：话语的构建性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谱系学研究的特点为：权力的话语性、话语的政治性和社会变革的话语性。以此为出发点，下面从三个方面讨论福柯话语研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

首先，福柯的话语研究强调话语与话语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认为这是话语建构性的具体体现。例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关于“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论述就强调了陈述与陈述之间的关系。所谓“陈述”即是对某一问题的说明，如“他疯了。”便是一个陈述，是对“他有疯病”这个事实的陈述。福柯通过观察四个不同层次陈述的形成来研究陈述如何在医学、自然史、语法和政治经济等领域形成的。这四个层次的陈述是：事物（objects）、谈吐情态（enunciative modalities）、概念（concepts）和策略（strategies）。就这四个层次的陈述而言，福柯强调每一层次上陈述与陈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陈述形成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认为这些联系体现陈述的“话语形成”规则。以福柯对“疯病”的话语形成的研究为例。在医学领域中的“事物”这一层次上，福柯研究了“疯病”通过话语得以形成的过程。他认为决定是否是“疯病”的根据不是“疯病”本身，或者说，不是“疯病”的特征，而是“疯病”与其他相关事物的联系，是有关“疯病”这个事物的话语出现所必需的条件，如行为方式，规约系统，分类方法以及概括模式。福柯认为，在某一事物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该事物与它所联系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田海龙，2009: 41-42）。

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论述强调了陈述与陈述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这种联系不仅是一个层次内陈述与陈述的联系，而且在一个层次与另一个层次之间陈述彼此间的联系对事物、谈吐情态、概念和策略的形成也非常重要。换言之，这四个概念的形成不仅由其各自内部陈述之间的联系决定，也由这四个层次彼此之间的联系决定。以语法中谓语“概念”的形成为例。福柯认为，谓语这个概念的形成并非仅是

由它与语法中的其他概念（如主语和状语）的关系决定，谓语概念的形成不仅是由概念这一层次内部陈述之间的关系决定，而且还通过谓语与其他层次的陈述的关系决定，如通过“策略”层次上的语法理论来决定。语法中“谓语”这个概念的形成不仅由它与“主语”和“状语”的关系决定，也需要语法理论对它的描述来决定。这里，“主语”、“状语”和“谓语”一样属于“概念”这一层次，语法理论则属于“概念”层次以外的“策略”层次（同上：42-43）。

福柯强调陈述的四个层次与各自相联系的物体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形成中的作用，进而提出“话语形成”的理论，表明了话语的建构特征。同时，通过强调陈述的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形成中的作用，福柯说明了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对话语建构作用的重要性。这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从事的彼此孤立、绝对静止的语言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

其次，福柯强调话语的历史性，将权力/知识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新的话语会不断产生，规范社会生活。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创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可以创造条件使社会的各种可能成为事实，另一个是权力可以把事物区别开来，并且可以维持事物各自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权力的这种创造性与知识紧密相连，“每一种权力关系都构成一个相应的知识领域，同时，任何知识都预设并构成相应的权力关系”（Foucault, 1972: 27）。不仅如此，权力的创造性也因此与话语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话语“在创造我们所是的主体过程中以及在创造我们所认识的主体（包括我们自身的主体）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4）。

福柯在研究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时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以探索社会由于对断裂的、偶然的、具体的、混乱无序的以及危险暴力的话语表示出极大的恐惧而制定的约束体系。1970年，福柯获得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席位，在12月2日的就职演讲中，他以“话语的秩序”为题，论述了三类约束体系对话语生产实施控

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情况。一类约束体系就是禁忌、禁闭和求真意志这样外在的排斥，另一类约束体系是话语内部的评论、作者和各种学科对话语实施着求同去异的限制工作，还有一种约束体系就是强加于话语的实施规则，是话语进入社会所必须遵守的规则。通过论述这些约束体系，福柯表明话语的生产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一个随意的过程，它受到各种限制，“人们没有权力说任何事情，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任何人都无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Foucault, 1984 : 109）。福柯的这些论述不仅把话语置于社会的大语境加以研究，而且赋予了话语的动态性和历史性。

福柯在对话语分析时所强调的话语的关联性、历史性、动态性、建构性，同时也体现着他赋予话语的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以及意识形态特征。福柯在讨论“事物”的话语形成时，认为这取决于不同话语形成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一个话语形成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这种对话语关联性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深入为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时，福柯引入“话语秩序”的概念来讨论话语形成的限制问题，不可避免的将话语的建构性与其约束体系联系起来，进而研究权力在话语构建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对福柯来说即是政治实践，也就是说，通过对话语的控制实现对意义的掌控。而这个实现对意义控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的过程。正如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92 : 67）所言：“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在福柯的话语研究中，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所维系的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这些集合体之间的关系；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也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出发构建、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或使这种意义自然化。可以看出，话语的各种特性在福柯的研究中交织在一起。

### 三、巴赫金其人其符号

关于巴赫金其人，在学界有许多公认的地方，也有仍未定论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巴赫金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富创意的符号学思想家之一（王铭玉等，2013 : 107），已是不争的共识。同时，巴赫金

在他的著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才享有这一声誉的事实也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根据赫奎斯特的研究，在美国认可巴赫金重要思想家地位最初是在1968年，当时《耶鲁法语研究》第41期发表题为“游戏在拉伯雷作品中的作用”一文，提及许多国际知名的理论家，巴赫金名列其中。当时，介绍巴赫金的文字这样写到：“巴赫金正在接近他漫长生涯的尽头，然而只是在最近他思想的勇敢和思考的宽广才在他俄国有限朋友和同事圈子外边得到赞赏”（Holquist, 1986 : ix）。从那时起的20年间，巴赫金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学术界，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的关注。

关于巴赫金其人未定论的问题，主要与他早期作品的署名有关。特别是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本书，由于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而使其署名问题更为学者关注。这本书的署名是沃洛希诺夫（V. N. Volosinov），他和巴赫金有过学术上的交往，是巴赫金不同时期圈子内的成员。然而，与巴赫金一生坎坷不同，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国立话语文化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不幸的是他在1914年就患上了肺结核，于1936年52岁时病逝。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本书的真正作者（还有其他两本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署名为Volosinov或者Medvedev的书）开始被认为是巴赫金。伽迪那（Gardiner, 1992 : 196）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场关于署名的争论，指出虽然有些学者（如Todorov）对这几本书的作者是巴赫金表示怀疑并持谨慎的态度，甚至有的学者（如Titunik）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伽迪那却对此问题持有一种折中或不可知的态度。然而，也有学者坚信这些著作作为巴赫金所著，如赫奎斯特（Holquist, 1981 : xxvi）认为这种可能性高达90%，更有学者（如Fairclough, 1992 : 119）认为沃洛希诺夫是巴赫金的笔名。本文作者属于这最后一类学者，所以我们在下面讨论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的时候，也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本书为基础。

其他关于巴赫金其人有所不同的表述是关于他的生卒年月。王铭玉等（2013 : 107）指出，巴赫金生于1895年11月17日，卒于1975年5

月16日。赫奎斯特(Holquist, 1981: xxi-xxv)则认为巴赫金生于1895年11月16日,卒于1975年3月7日。托多罗夫(Todorov, 1984: 5)也将巴赫金去世的日子记为1975年3月。其他关于巴赫金其人的介绍,包括他的生平和经历,可以参考赫奎斯特(Holquist, 1981)和托多罗夫(Todorov, 1984)的相关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涉及符号学、对话理论以及狂欢理论,这里我们主要从后现代主义语言思想的角度讨论他的符号学思想,特别是讨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论述的符号学思想。

首先,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强调符号的历史性,这源于巴赫金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孤立的、静止的、与实际语境脱离的抽象语言,这种语言研究脱离历史的语境,更无法涉及更广阔的语言运用的社会场景。这种研究语言的倾向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假设语言系统与语言历史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断裂(Volosinov, 1973: 54)。与这种语言研究倾向不同,沃洛希诺夫辨析出另一种语言研究的倾向,总结出这种倾向语言观具有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个体言语行为中实现的永不停止的繁衍过程;第二,语言繁衍的规则即是个体心理运行的规则;第三,语言繁衍是有意义的创作,就如同艺术创作一样;第四,作为现成的产品和稳定的系统(词汇、语法和语音),语言可以说是一个内壳,是语言创作凝聚的熔岩,语言学家可以从中抽象出一个结构,用作现成的工具进行实际的语言教学(Volosinov, 1973: 48)。沃洛希诺夫将这样一种语言研究倾向称之为“个体主观主义”,并与他称之为“抽象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倾向加以区别,进而摒弃注重抽象的语言研究倾向,强调语言研究要更加注重个体的言语行为和个体的心智以及一种不间断的创作过程。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批判,沃洛希诺夫阐明“语言的历史性是它的基本特征”(Gardiner, 1992: 10)。

其次,沃洛希诺夫的符号学思想将符号赋予意识形态意义。基于注重个体言语行为研究的语言观,沃洛希诺夫视语言运用与语言运用者的意识和心智相关。同时,由于注意到语

言运用中人的心智因素,沃洛希诺夫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他指出,由于个体言语行为中的心智作用,语言符号可能成为一个物质载体或一个事实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这个语言符号不完全反映这个事实,或者是折射这个事实,那么这个语言符号就成为意识形态产品。意识形态的范畴与符号的范畴相吻合,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符号一旦出现,意识形态也就随之而出,任何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东西都具有符号的价值(Volosinov, 1973: 9-11)。沃洛希诺夫把符号与意识形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二者不能分离。在沃洛希诺夫看来,符号一方面可以反映社会事实,成为社会事实的影子,甚至成为事实本身,另一方面语言符号可以折射或者歪曲社会事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符号也是一个物质体,是任何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符号的载体,它以声音、颜色或手势的形式存在。沃洛希诺夫关于符号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论述大大超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藩篱。

意识形态在沃洛希诺夫看来不仅具有物质性,与符号不可分割,而且具有社会性,它存在于有组织的个体之间的交流以及这些交流所产生的符号之中(Volosinov, 1973: 12)。沃洛希诺夫关于“符号学是社会的”思想强调了个体在形成一个组织之后进行交流的特点,换言之,个体言语行为有一个支撑个体的机构。除此之外,“符号是社会的”观点还强调要理解符号,不论是内在符号(以自我反省形式存在的经历)还是外在符号(客观实在的经历),都需要了解符号所镶嵌其中的情景,而且,这种情景是与外部经历相关的所有事实的集合,简言之,是一个社会情景(Volosinov, 1973: 37)。正如沃洛希诺夫(同上)强调的那样:“符号与其社会情景不可避免的交织在一起,符号一旦离开社会情景便失去了作为符号所具有的特性。”对此,克瑞斯(Kress, 2001: 37)更直截了当的写道:“社会就存在于语言符号之中,不是在它周围,不是和它有对应关系,也不是作为资源在那里等待使用,而是与符号形成一体而存在。”

沃洛希诺夫的符号学思想还有一些特点,体现出他对符号的独到理解。王碧玉总结出巴

赫金对符号性质的七点概括,除了以上提及的符号具有的历史性、意识形态意义以及社会性以外,王铭玉等(2013:108-113)指出符号还具有物质性、可解码性、话语性以及元语言性。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这里对巴赫金关于符号三个特性的认识足以说明他在后现代主义语言思想方面与福柯的相似之处。

#### 四、话语与符号之后现代性

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时间上出现在现代主义思想之后,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利奥塔,1997),而是对现代主义声称的某些观点的重写。就对语言的认识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体现为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批判,故也称为后结构主义(Baxter,2003:6)。在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论是福柯的话语思想还是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都体现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彻底批判。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由孤立、静止、封闭的语言系统转为活生生的、实际运用的话语和符号,更主要的是体现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意义不是靠系统内部语言成分(或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体通过话语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的,因而是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第二,权力贯穿于语言使用的全过程。不论是话语还是符号,它们在社会语境中的运用与不同的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不仅成为权力斗争的场所,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内容;任何社会主体在其获得权力的斗争中都不可避免的要取得对话语的控制,甚至获得话语和符号这个资源本身。第三,由于权力运作于话语和符号之中,话语或符号对事实的再现便不能洁身自好;它不可能再真实的再现事实,只能依据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兴趣对事实进行不同程度的折射。所以,意识形态便与话语或符号紧密的纠缠在一起。第四,话语和符号再现社会事实的作用更多的变为它对社会事实的建构。它不再像语言那样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成为社会主体建构身份、建构事实以及建构彼此关系的手段。

由于福柯和巴赫金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思想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高度契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分别使用的“话语”和“符号”两个术语

的内涵彼此相互接搭。实际上,已有学者在这两个术语之间架起桥梁使其相互通达。例如,在讨论福柯“话语”的文献中,沃达克(Wodak,1996:24)就有这样的表述:“任何事情都有符号的特征,每个符号都在一个无尽的序列里指另一个符号。”费尔克劳更是使用“符号”这个术语赋予“话语”这个术语以更广泛的意义(Fairclough,2003)。威斯瑞尔(Wetherell,2001:381)在讨论不同的话语研究传统时也将巴赫金与福柯相提并论,而且把他们的研究都收在他和同事合编的话语理论与实践的读本当中。另一方面,巴赫金对“互文性”的论述,对“言语语体”的论述以及如上所述巴赫金对语言的后结构主义解读,都已经成为话语分析学者(例如Fairclough,1992;2003)进行话语分析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讨论至此,我们对巴赫金的著作在其出版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引起学界的注意,可能会有一些独立的理解。巴赫金的著作与福柯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呼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的著作节选被同时选入话语研究的读本(如Jaworski & Coupland,1999;Wetherell et al.,2001),他们的思想同时受到学者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的学术思想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然而,我们认为,巴赫金的学术思想被重新发现不仅是前苏联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是因为这与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文化特征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战以后,一些发达国家从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社会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再仅仅从事生产,他们和顾客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推销产品的活动对语言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消费经济、保险以及电话销售等行业也越来越多的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随着数字通讯、电脑、网络通讯等新技术媒体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网络销售以及信息服务等新兴行业对语言运用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入微,而且新闻媒体、广告商以及播音员也对语言的运用进行改造,创造出新的词汇和表达。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语言也成为商品,在推销其他产品的同时也被推销,不仅成为通过语言实现自身目的的社会主体的关注焦点,也成为解构其神秘功能、

探索其巨大力量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这样，巴赫金对语言运用的符号学阐释以及福柯对语言的话语解读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汲取的养分。

## 五、结语

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尽管名称各异，但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观点的批判却是殊途同归，对语言的后现代主义解读更是一脉相承，理解二者在语言思想上的共同点可以帮助我们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更有实效的进行语言研究。季国清（1999）曾经指出，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现在看来就是要突破语言研究现代主义思想的藩篱，充分认识语言符号和话语的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意识形态特征，破除意义的确定性，树立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改变追求统

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意图。要通过对话语言符号及话语的分析探究使用语言的社会主体的特征，解构作用于语言符号和话语的机构权力和意识形态神秘机制，探索语言符号及话语建构社会事实、建构社会关系以及建构主体身份的方式。许力生（2013：142）分析批评话语分析遭遇批评的原因时指出，这些学术争论“实质上就是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观念碰撞和冲突”。以此延伸开来，我们可以说，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下讨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给语言学研究最迫切的启示或许就是需要认识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学科知识正在发生转移，哲学基础正在开始转变，研究范式也在更新，语言学者的工作也在日益政治化。

## 参考文献：

- [1] Baxter, J. *Positioning Gender in Discourse: A Feminist Methodology*[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 [2] 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3]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4]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5]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Discourse[A]. In M. 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4.
- [6] Gardiner, M. *The Dialogics of Critique: M. M. Bakhtin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7] Holquist, M. Introduction[A]. In M. M. Bakhtin(ed.)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 [8] Holquist, M. Introduction[A]. In M. M. Bakhtin(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9] Jaworski, A. & N. Coupland. *The Discourse Reader*[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10] Jørgensen, M. & L.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11] Kress, G.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A]. In W. Margaret et al.(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C]. London: Sage Publicatins, 2001.
- [12] Todorov, T.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 [13] Volos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 [14] Wetherell, M. Debates in Discourse Research[A]. In W. Margaret et al.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C]. London: Sage Publicatins, 2001.
- [15] Wetherell, M., S. Taylor & S. Yate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M]. London: Sage Publicatins, 2001.
- [16] Wodak, R. *Disorders of Discourse*[M]. London : Longman, 1996.
- [17] 高玉.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8] 季国清. 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 [J]. 外语学刊, 1999, (1).
- [19] 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20]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21] 莫伟民. 莫伟民讲福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2]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3] 王铭玉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4] 许力生. 话语分析面面观: 反思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